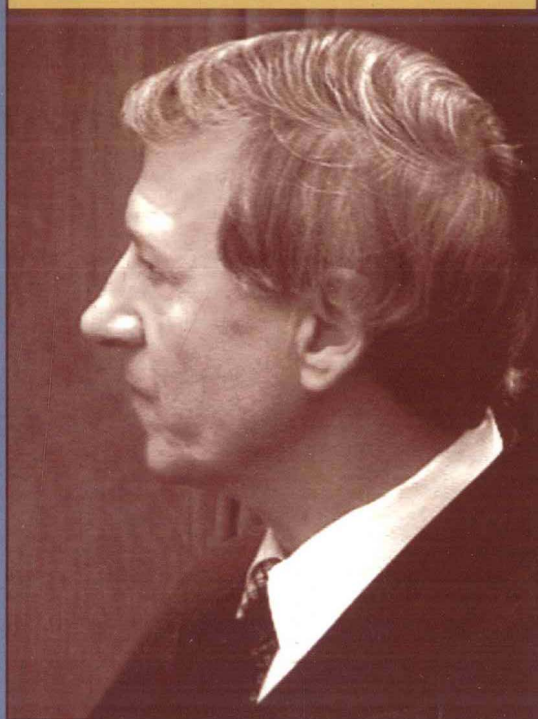




社会理论译丛



超越左与右

—— 激进政治的未来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 社会理论译丛 ·

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著
李惠斌 杨雪冬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

·社会理论译丛·

著 者 /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译 者 / 李惠斌 杨雪冬
策 划 / 薛晓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国际文化事业部
(010) 65140868
责任编辑 / 程晓燕 杨雁斌
责任校对 / 徐登里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市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
字 数 / 264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49-272-2/C·043
著作权合 / 图字 01-2000-0683 号
同登记号
定 价 / 1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英]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著;李惠斌,杨雪冬译. - 2版. - 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
(社会理论译丛)
ISBN 7-80149-272-2

I. 超... II. ①安... ②李... ③杨... III. 政治
社会学-西方国家-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842 号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Anthony Giddens

英国 Polity 出版社全权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简体字版权,
中文简体字版根据英国 Polity 出版社 1998 年版译出。

解构、重构与超越

(译者序言一)

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教授，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随着英国左翼政党（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执政、社民党纷纷走上欧洲政治舞台，作为左翼学者的吉登斯，其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时期。除了大量发表的专著以外，吉登斯还在诸如《新政治家》等刊物上频频撰文（《处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1997年5月；《左派瘫痪之后》，1998年5月），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左翼在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政治策略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被人们称为布莱尔和英国工党的精神领袖。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超越左与右》就是吉登斯近期思想的一个系统论述。

一、左派、右派及其超越

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说明保守主义在它自己的演进中已经走向了反面，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吉登斯按照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把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

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勾画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义的反面的思想历程。同时吉登斯也研究了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革命理论发展为它的保守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历程。他于是得出结论说，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用吉登斯的话说，“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

吉登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党政治现象：左和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欧洲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政党政治方面的词汇，“左”也好，“右”也罢，当我们使用这些词汇时，我们实际上是假定了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历史中心。在中心的这一边，人们称之为“左”；在中心的另一边，人们称之为“右”。在一个特定的革命时期，这种左右之分就会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谈不上革命。但革命是特定时期的工作任务——革命时期，革命政党的任务是试图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不可能是永恒的工作中心。因此，一个政党或组织，尤其是执政党，其工作中心就不能总是偏离历史的中心。所谓“越左越革命”，“宁左勿右”，只是极端革命时期的“矫枉过正”，不可能成为永恒的工作中心。当一个政党或组织从边缘进入中心以后，任何一方的偏执都是不利的。立场变了，立足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也一定会跟着改变。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变化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考虑到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立足点一直都在左的方面，党内普遍存有根深蒂固的宁左勿右的心态。现在我们知道，左和右一样，都是不正确的。这说明我们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我们真正走到

了历史的中心。当然，并不是原来的左和右不存在了，而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的左派或激进派（如果他依然坚持他过去的观点的话）有可能因为对过去的留恋而对现实不满，从而变得保守和向右转，而过去的右派则有可能因为抱怨改革的步子太小而成为左派或激进主义者。欧洲与中国不同，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所以左派和右派往往与两党之争有关。为了在竞选中获胜，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需要尽量向历史的中心靠拢，以便取得选民的支持。

虽然东西方在左与右问题上有上述的不同和变化，但是，左右之争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真理并不是装在某个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东西，所以，左右偏离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不同的政党，那么，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党派之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左右之争并不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会成为陈词滥调，况且“陈词滥调”也是会有人重复的。实际上，吉登斯本人的所谓“超越”也是不彻底的，他在本书中提出的“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实际上依然是欧洲新左翼的政治纲领。只不过如吉登斯所说，他“这里所说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激进主义，而是认识到哲学保守主义坚持的连续性的重要性而变得温和了的激进主义”。

二、关于“全球世界主义秩序”

吉登斯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曾经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认识到，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凯恩斯

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程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所有者“失去了很多权力。国家控制了很多从前掌握在个人资本手中的决策权和资源，结果是把国有化与福利制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因此，“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再叫做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吉登斯对市场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瑞典模式的成功不可能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普及到所有的或大部分经济秩序中，这是因为：（1）资本不可能被废除；（2）中央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困难有可能重新出现；（3）经理的正常选举有可能产生不利的结果；（4）公司资本会因为倾向于躲避风险而造成企业停滞；（5）由于个人股份的降低而使企业不积极吸纳新工人；（6）由于个人不能带走股份而影响企业间的人员流动；（7）社会主义将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技术停滞，对资本的无序政治拍卖以及中央政府为了防止或纠正工人合作社的弊端而采取的频繁的行政干预。

在吉登斯看来，革命的时代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即他所谓简单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代化进程正在成为一种全球“反思”的时代。随着前苏联单一中央控制模式社会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也正在成为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方式，而社会主义也正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和单一了。吉登斯不像其他西方左翼作者那样喜欢使用“后现代”这个词，他认为用“反思的现代化”和“后传统社会”更能反映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质的把握。吉登斯所谓“反思的现代化”有三大特征：一是“全球化的冲击”；二是“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三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方面的全球化冲击。卫星广播和电视使得全球各方面的信息同时进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铺天盖地的广告以不可抗拒之势把现代生活带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由于大量广告和文化商品化的影响，以共同爱好、习惯和信仰组成的社区间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都被“标准化了”；同样，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在向全世界撒播：“服装类型，从套服到蓝色工装裤，音乐、电影方面的爱好，甚或宗教信仰等等，都可以在全球流行起来”；这种冲击的必然结果是多向度的文化运动：一方面传统得以保留和传播，另一方面新的东西又在不断引进，“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因此，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又会反过来影响全球化”。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广泛冲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或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该怎样做？我怎样面对外部的世界？这就是吉登斯为读者勾画的一个“反思的现代化”或“后传统社会”的情景。

吉登斯把这种后传统社会称之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后传统社会的第一代，后传统这个词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后现代’。后传统社会不是单一民族的社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

三、毕竟是“重构激进政治”

吉登斯虽然大谈左和右、激进与保守都被历史超越了，但是，他却在序言中写道：“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

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它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保留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所谓全球化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吉登斯却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提出了“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可见，尽管他提出了超越论，他本人依然站在西方左翼的立场上，骨子里依然是激进派，而且“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吉登斯主要从经济压迫和贫困方面批判资本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依然有许多马克思提出过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的伦理、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经济上的两极分化”。

自从布热津斯基宣布“大失败”和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以来，吉登斯是很少几个不赞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作者之一。他的所谓“超越”，其中当然也包含着这一层含义。吉登斯的所谓全球世界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他讲的“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六点框架的主要内容是：（1）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5）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

吉登斯的这个激进政治框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构思。很显然，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方案，在左翼与

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这是不少西方学者都在试图做的一项工作，其原因是人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发现了原有理论和现实政治模式的局限。大量的事实和文献资料表明，不仅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也正因为其虚伪性而受到选民的消极抵制，从而使这种传统的西方民主模式遇到了挑战。这是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意识到的问题。因此，吉登斯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不失为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不仅如此，吉登斯还把社会团结和稳定、生活和生存问题、民主和对话以及反贫困、反暴力等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也是很有价值并具有时代意义的。

但是，吉登斯的这个框架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笔者看来，吉登斯的局限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没有在经济层面上去了解社会主义问题，正如他在书中引述的熊彼特的那句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去把握，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提出一个美好的构想是不难的，难的是找出现实存在的困境和问题的原因，并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二，吉登斯对于中国 20 年来的改革成就及其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他没有看到中国 20 年改革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许，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还需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露出来。但是，对于中国的改革了解得多一点的人会看到，中国改革的成就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不是什么生产主义的。总之，对于中国的改革还应该更乐观一些；其三，由于以上两个局限，使得吉登斯像大多数西方作者一样，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作了错误的理解。首先是对于 1989 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发生的变化缺乏准确的评价，或者换句话说，苏联模式的失

败并非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这是许多作者都弄混了的一个问题。

现在，相当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实质上是苏式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当然，这种试验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可是中国 20 年的改革中把市场机制引入原来的社会主义结构以后，重新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新的内容，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吉登斯虽然意识到“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再称其为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根据产权结构向社会化演进的变化情况来重新界定英国这样的国家的社会性质，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全球世界主义”。实际上，产权的个人占有和国家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过渡，是一个全世界的经济现象，如果说存在着一种融合的话，那是一种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模式向社会主义的融合，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消亡为标志的融合。吉登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社会主义采取哪一种模式是可以讨论和试验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可能在下一个千禧之年人们会看得更清楚。

李惠斌

1999 年 10 月

能否建构一个安全能动的社会？

(译者序言二)

如果罗列 90 年代在中国最有知名度的西方社会学者的话，吉登斯恐怕要名列其中。其声望的建立一方面得益于一些中国学者的鼎力介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所建构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而且其思想在 90 年代中期被英国工党接受，成为后者恢复失去了近 20 年的执政地位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学术界中的活跃分子转瞬间变成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明星，被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世界之外的人所认识，其倡导的“超越左与右”的思想成了西方主流社会中最流行的术语，“第三条道路”成了政治家吸引选民的最煽情的口号。

在某种程度上，吉登斯的最大贡献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的学术主流一直以校园为基地，或者醉心于纯粹思辨，或者潜心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倡导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主张价值中立，不问政治的功能主

义、结构主义成为这两种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主导着整个西方学界。60年代步入学界的吉登斯并没有拘泥于这种状况，反而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可以说，在目前西方主要社会理论家，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家中，吉登斯是与主流政治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他不仅从一个社会学家特有的视角密切关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且在批判的同时，积极提供更现实的解决路径。这也许是当代西方学术发展中一个最引人关注而且发人深思的情况。

一、吉登斯其人其书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大学教育是从赫尔大学开始的。他先想主攻英语，被拒绝后又试图学哲学，由于感觉索然无味，遂改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没想到这反而成了他沉浸身心的职业。1959年毕业后吉登斯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硕士，论文题目是《现代英国的体育和社会》，研究了体育，特别是足球与现代英国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段学习经历使他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30多年后，1997年，他重新回到这里，以院长的身份主持这所名校的工作，罗揽人才，把它变成了英国工党重要的思想库。同时，吉登斯还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这家现在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非常活跃的出版社的创办者。

1961年毕业后，吉登斯先后在莱斯特大学、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1969年受聘于英伦名校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此后长期在此任教。这是吉登斯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因为剑桥大学在英伦学界的主导地位及其世界性影响，为吉登斯迅速在西方学术界中占据

一席之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早在 60 年代后期,吉登斯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开始着手制订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主要包括:(1)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梳理和批判性重组;(2)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种变量的辨识与分析;以及(3)人类学的研究项目。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吉登斯没有拘泥于狭义的社会学研究,扩大了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积极关注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力图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进自己正在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丰富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和层次性。同时,他不断提升自己理论的深度,从一个社会学者向社会理论家转变。在这一点上,他与哈贝马斯走的学术路径非常相似,虽然双方最初所受的学术训练不同(吉登斯的学术训练似乎更有实证性;哈贝马斯的似乎思辨性更强)。他们都是从梳理西方学术传统,尤其是欧洲思想传统入手,然后在解读传统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分析概念,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接着用这种框架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并且逐步涉足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最终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一种被这些领域承认并利用的广义社会理论。

按照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可以把吉登斯的学术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 70 年代,吉登斯从分析和梳理欧洲传统思想,特别是三大古典社会理论家,即马克思、韦伯以及迪尔凯姆的著作入手,开始逐步创造自己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1971 年,他出版了分析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著作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标志着他正式步入社会理论的王国并在梳理欧洲思想传统上取得初步成就。这本书被认为是了解社会学的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出版后几乎每年都被重印。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 1972 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

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和 1978 年出版的《迪尔凯姆》。1976 年,《社会学方法新规则》出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式提出。1979 年,他发表了《社会理论的中心难题》,继续阐述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其中第一次把时一空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1981 年,《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书出版,在该书的第一章,他完整地勾画出结构化理论。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 80 年代至今。吉登斯逐步运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活。1981 年的《权力、财产与国家》与 1985 年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是最初的尝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4 年,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一书出版,副标题是“结构化理论大纲”,该书被认为是吉登斯迄今对自己的结构化理论的较为详尽的阐述。在 90 年代,吉登斯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等书更深入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而《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等书则代表了吉登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吉登斯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除了上述一些著作外,他还有几本论文集,并且主编了许多论文集。分别在 1989 年和 1990 年出版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原著选读》是英美两国社会学系学生使用的教材。

吉登斯的理论构架十分庞大,而且涉及范围极广。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这里只介绍一下与《超越左与右》一书有关的吉登斯的主要社会政治思想。

二、“二元”困境与结构化理论

6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以

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生产结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角色、国家间关系等整体性宏观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动摇了启蒙时代以来确立的整套社会认知标准、价值取向以及信仰体系，西方社会陷入一片困惑。1968年席卷西方主要国家的学生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整体困惑的极端体现。而在社会科学界，则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那种拘泥于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框架中的认识方式，多种理论交相出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和面临的问题。其中一度最引人注意的是两大思想流派，一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另一方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前者主张全面改造西方晚期资本主义，但是同时对于西方社会的前途流露出强烈的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进步或者带来人的全面异化，或者为新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者则固守价值中立，对西方社会问题采取逐渐改造的态度，认为技术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保持乐观的同时，忽视了对社会的批判。

这种两极化的态度和认识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困境。这种困境的源头不仅有古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基督教精神。只是在启蒙时代后，这种困境似乎更为显著，并且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一自然、科学—宗教、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关系成了人们认识和实践最便利的框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具有一种“便利性”，对于人们认识这个纷繁的世界是方便的工具。同时由于这种便利，也容易简单化，从长远和深层来看，实际上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使整个社会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中。而整个社会科学界也没有摆脱这个困境，为了理论上的逻辑性，夸大个别因素的解释能力，造成